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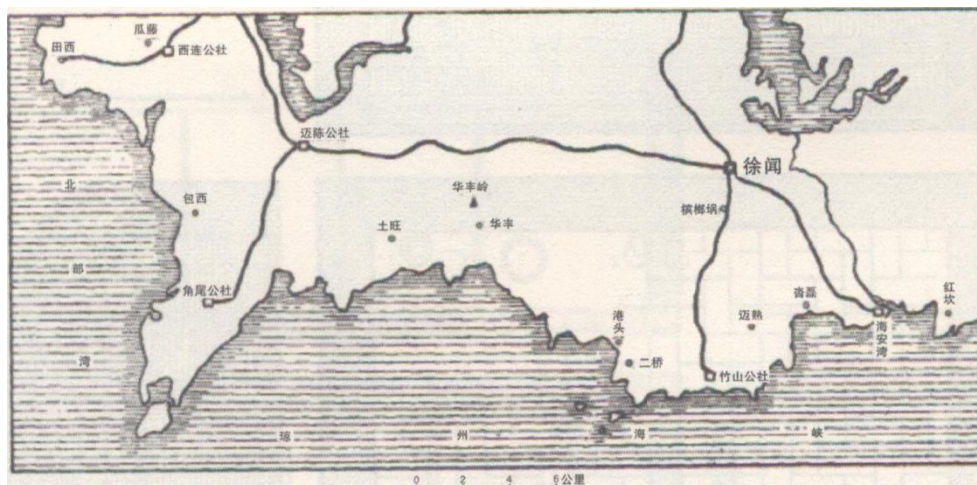
# 广东徐闻东汉墓

——兼论汉代徐闻的地理位置和海上交通

徐闻县是广东最早的县治之一，远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已经设置<sup>[1]</sup>。它位于雷州半岛南端，南隔琼州海峡遥对海南岛。两汉时期，徐闻是我国驶往东南亚和印度洋的海船出发港，又是广东大陆通向海南岛的门户，在广东古代历史上曾经占有重要地位。

1973年冬至1974年春，广东省博物馆会同湛江地区文化局在徐闻进行了一次文物调查，并在迈陈公社华丰村、龙塘公社红坎村和附城公社槟榔埕村三地发掘了51座东汉墓。参加这次工作的有：广东省博物馆吴振华、何纪生、赵金顺、杨少祥，湛江地区博物馆黎智波、鍾绍益，阳春县文化馆柯池，海康县文化馆邓杰昌和徐闻县文化馆邓开朝、吴增、姚秀琴等同志。

## 一、汉墓概况



图一 徐闻县汉代遗址和墓葬分布示意图

### （一）汉墓地点

这次发掘的汉墓在华丰村有34座，红坎村有12座，槟榔埕村有5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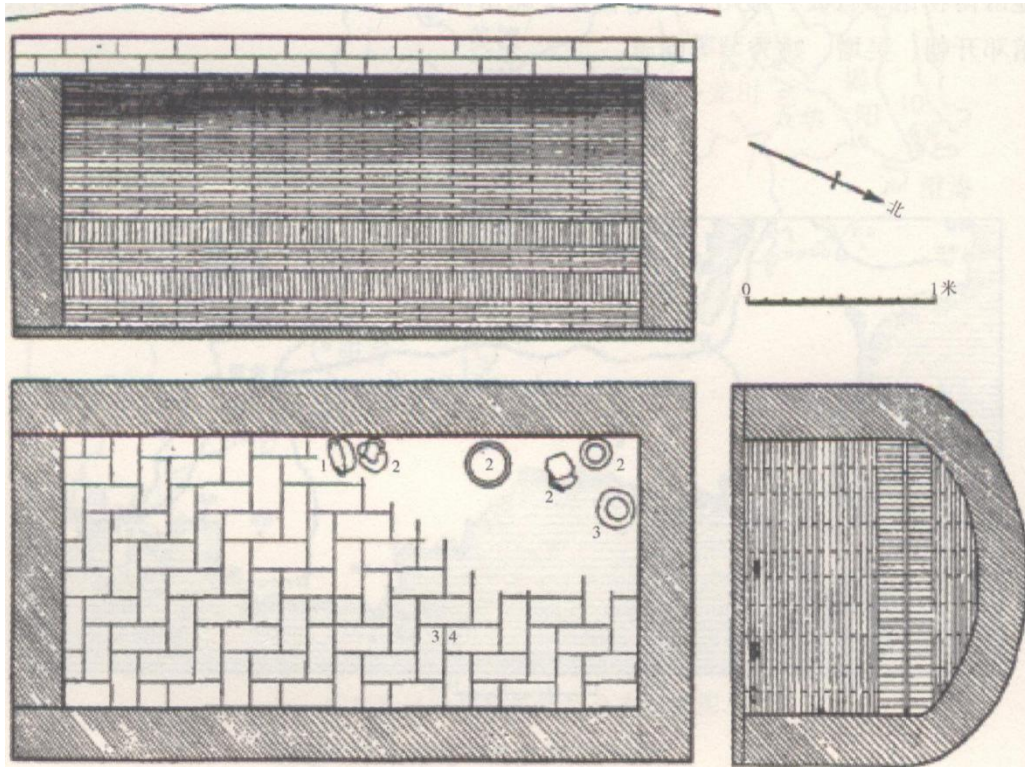
华丰村和红坎村都在县南琼州海峡岸边的高崖上，相距约17公里（图一）。崖上山丘起伏，崖下清波浩渺，地势甚为险峻。华丰村发现汉墓的地点有三处：两处是在村南，距断崖不足百米。墓葬分布密集，西面一片在600平方米范围内发掘了33座；向东百米处另有一片，但只发掘了1座。另外一处是在华丰村东北，范围也很大，因水土流失，墓已受到严重破坏，地表散布着许多墓砖，未作正式发掘。红坎村的汉墓在村北，距海峡也很近，断续相连达1公里。槟榔埕村距海峡6公里，与华丰村、红坎村呈三角形，这里的汉墓也多，据居民说村内经常挖到砖墓。

### （二）墓室结构

在51座墓葬中，45座是长方形单室平底券顶砖墓。另6座是砖石合构、石室和土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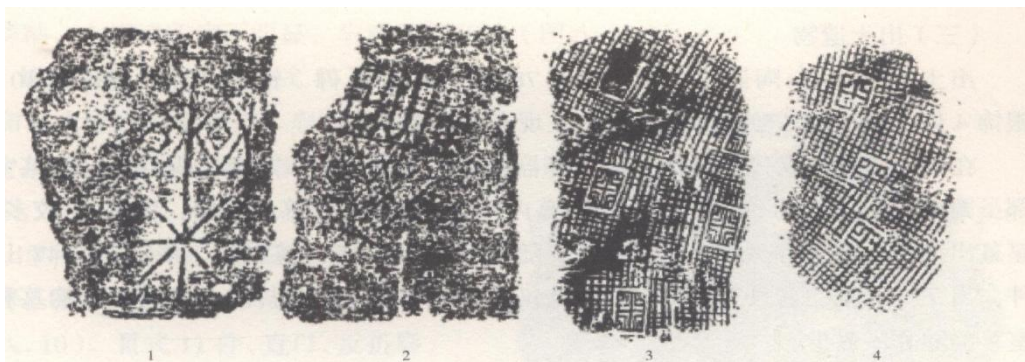
墓，全在华丰村。墓门基本朝南，墓室都很狭小，最大的墓 33 长 3.6 米、宽 2.04 米，最小的墓 23 仅长 2.14 米、宽 0.8 米，高度都在 1 米左右。

砖室墓大都双层砖，壁砖砌法是顺砖和顶砖相间，一般平砌二三层顺砖后放一层顶砖，交错向上，到上部全为顺砖，逐渐内缩向顶起券。墓底铺砖一层或二层，采用二横二直相间或曲尺形的砌法。封门砖的砌法和壁砖相似，但较为散乱（图二）。



图二 墓 33 平、剖面图

这里的墓砖和广州、佛山、韶关等地的不同，个小体薄，一般长 22-24 厘米、宽 11-12 厘米、厚 2 厘米。砖几乎全是红黄色，粗松易碎，少量在平面上印米字、方格或菱形花纹（图三，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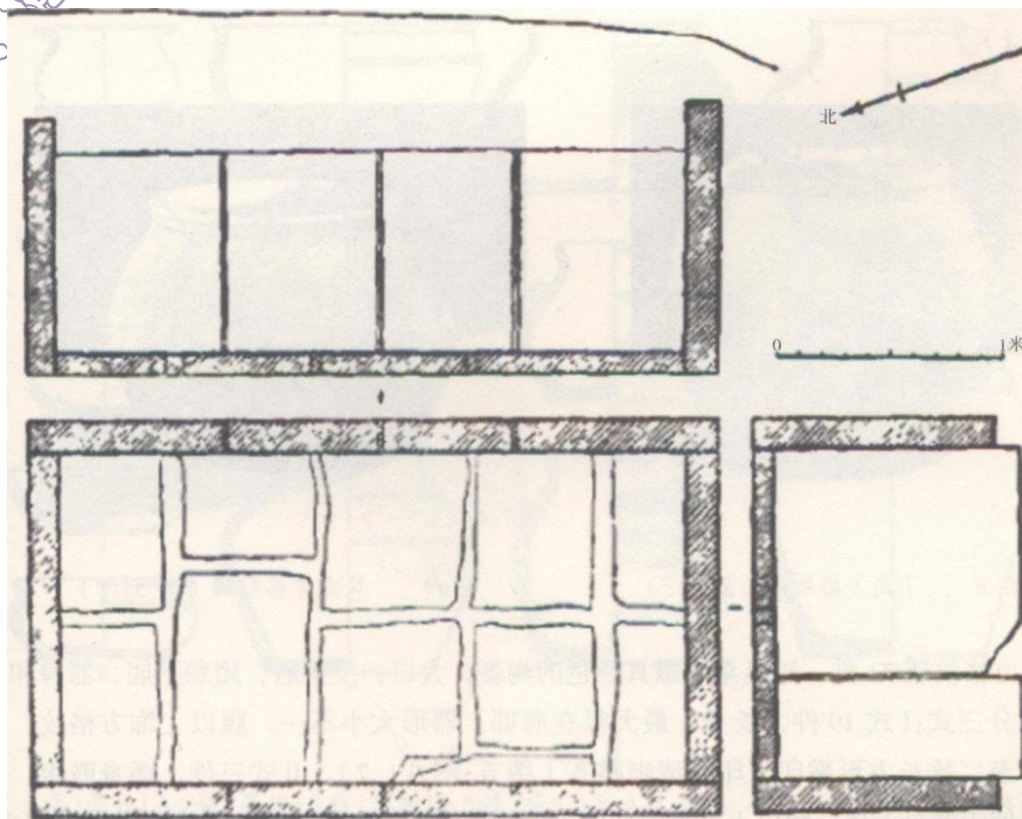


图三 墓砖花纹和陶罐纹装饰拓本（约 1/2）

1、2. 墓砖花纹（墓 33），3. I 式方纹格陶罐纹饰，4. II 式方格纹陶罐纹饰

砖石合构墓和石室墓数量不多，都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砖石合构墓顶部用砖起券，四壁和底砌大块的长方形石板（也有个别墓用砖铺底）。石室墓全用石板搭盖，呈立体的

长方形（图四）。石板采自附近海里的珊瑚石，厚约6厘米，灰白色，体轻质脆，在墓里被积土压成小块。



图四 墓11平、剖面图

### （三）出土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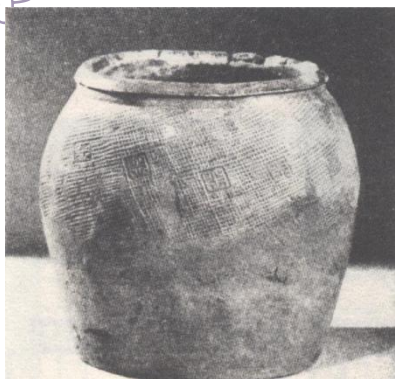
出土遗物计有：陶器 103 件，陶珠 78 粒，铁器 26 件，铜器 8 件，五铢钱 10 枚，银饰 4 件，珠饰 308 粒，另在填土中发现有肩石斧 2 件。

在崇尚厚葬的汉代，这批墓的随葬器物显然是微薄的。从墓室保存完好和墓室上部虽毁而未受破坏的 39 座墓看，6 座墓内空无一物。7 座墓出铁器，仅墓 47 较多。6 座墓出铜器，都只有一件。陶器是主要随葬品，但有 15 座墓没有，最多的墓 47 出 12 件，出 7 件以上的墓只有 6 座，其他墓仅出 1-3 件。比较而言，5 座砖石合构墓和石室墓的随葬品最少。

随葬器物大都放在墓室西侧，少者放在两角，多者列成一排。陶釜大都置于西北角。陶珠和珠饰大多出在墓室中部偏北处，有些还混在一起，应是颈下饰物。

陶器全是实用品，不见模型明器。陶胎是灰色细泥，火候较高，质地坚硬，器表大都挂一层黄褐色薄釉，只有红坎村出的小钵挂青绿色釉。夹砂陶器仅釜一种，应为炊器，青灰色，出土时难以完整取出。陶器纹饰简单，最多的是方格纹上加盖长方形戳印（图三，3、4），此外还有弦纹、水波纹和篦点纹。器形以罐为主，还有釜、盆、圈足盆、钵、小钵、小釜等。

釜 21 件，一般一墓出一件，侈口宽沿，束颈圜底；有的宽沿中间微凹，唇向上翘（图八，1）。



图五 I 式方格纹罐（墓 4:2）



图六 II 式方格纹罐（墓 3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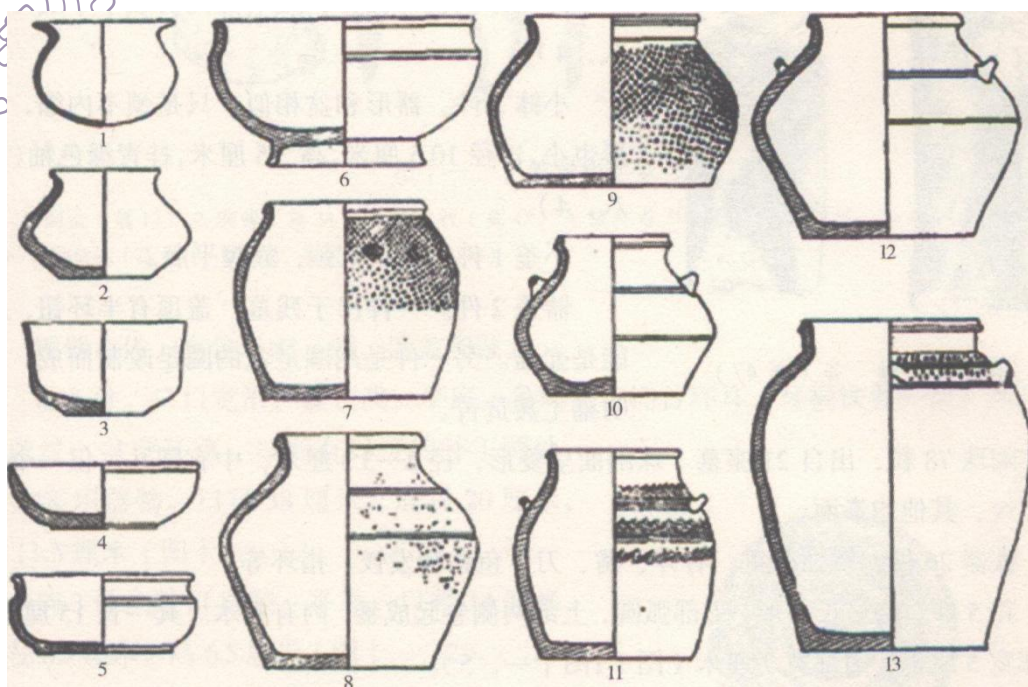
方格纹罐 31 件。这是墓中最具特色的陶器，大口，反折唇，短颈平底，器身和花纹又分三式：I 式 19 件，长身，最大径在肩部，器形大小不一。腹以上饰方格纹，加印一至二排长方形戳印，印纹清晰整齐（图五；图八，7）。II 式三件，矮身鼓腹，最大径偏于器身下部。腹上方格纹印痕深，线条也粗，中间加印一排方形戳印（图六；图八，9）。III 式 9 件，器身长宽比例介于 I 式和 II 式之间，口较小，颈略长。挂黄褐色薄釉，方格纹印痕不明显，肩腹部划弦纹（图八，8）。



图七 II 式罐（墓 32:3）

罐 36 件，分四式：I 式 17 件，器身和 III 式方格纹罐相似，肩腹部划弦纹，有两件在肩部加双横耳（图八，12）。II 式 6 件，圆唇，沿下凸出棱线，里面形成凹槽。鼓腹平底，器身矮胖。腹部划弦纹，肩有双耳（图七；图八，10）。III 式 11 件，直口、反折唇，器身较长。罐制作粗糙，表面经修削，无釉。肩部划弦纹和水波纹，双耳宽大结实，异于其他罐（图八，11）。另有一件直口方唇，颈外有三道凹槽，肩部施一周篦点纹，制作甚粗。IV 式二件，圆唇，沿下凸起棱线，器身长大，四耳。一件肩部饰方格纹；另一件饰篦点纹，

口径 19 厘米，高 36 厘米（图八，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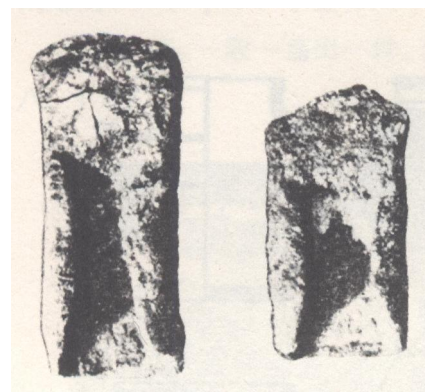


图八 陶器

1. 釜（墓 13）2. 小釜（墓 10）3. 钵（墓 50）4. 小钵（墓 47）5、6. 盆（墓 6、墓 10）7. I 式方格陶罐（墓 4）8. III 式方格陶罐（墓 30）9. II 式方格纹罐（墓 33）10. II 式罐（墓 32）11. III 式罐（墓 47）12. I 式罐（墓 30）13. IV 式罐（墓 47）（1、5、7、9、13，1/8；2、4，1/4；余均 1/6）



图九 盆（墓 6:9）



图十 铁斧（墓 47）

盆和圈足盆 8 件，大小不一。广口圆唇（有的唇外折），束颈平底（图九；图八，5）。2 件圈足盆是在盆底加喇叭形圈足（图八，3）。

钵 1 件。直口微侈，腹下部内折成小平底（图八，4）。

小钵 3 件。器形和盆相似，只是颈不内缩，器形也小，口径 10.5 厘米，高 3.5 厘米，挂青绿色釉（图八，4）。

小釜 1 件。侈口束颈，鼓腹平底。

器盖 2 件。一件出于残墓，盖顶有半环钮，可能是壶盖。另一件是用圈足盆的圈足改制而成，说明墓主甚贫苦。

陶珠 78 粒，出自 21 座墓。珠剖面呈菱形，径 2-3.5 厘米，中有圆孔，仅一个施篦点纹，其他均素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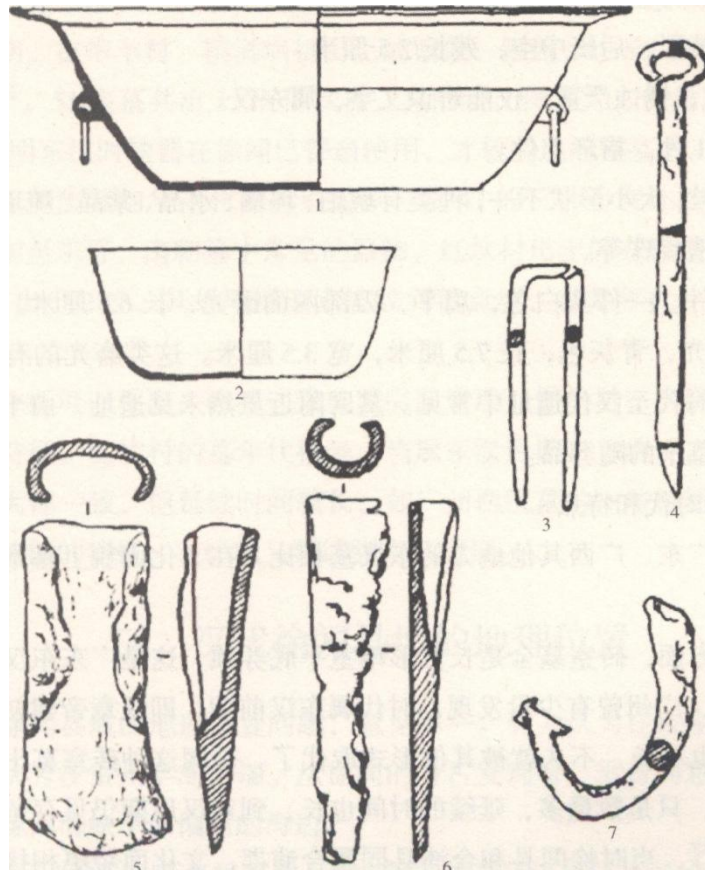
铁器 26 件，锈蚀严重，有斧、凿、刀、鱼钩和发钗、指环等。

斧 5 件。略呈长方形，刃部弧圆，上部两侧卷起成釜，内有朽木。其一长 15 厘米，釜部宽 5 厘米、刃部宽 7 厘米（图十；图十一，5）。

凿 2 件。梯形长条，圆釜，刃部扁平，釜内有朽（图十一，6）。

刀 10 件。长条形，脊厚刃薄，锋端斜出，后端有的细长，装木柄，有的是环首，长 21 厘米、宽 1.2 厘米（图十一，3）。有一件长 41.5 厘米，锋端齐平。

此外有鱼钩一件，有倒刺；发钗一件，马鞍形；指环一件。另有 6 件残甚，器形不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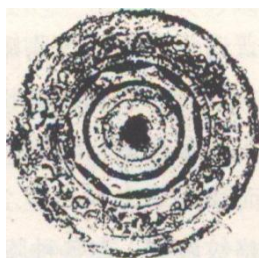
图十一 铜器和铁器

1. 铜盆（墓 12）2. 铜碗（墓 34）3. 铁发钗（墓 47）4. 铁环首刀（墓 47）5. 铁斧（墓 47）6. 铁凿（墓 47）7. 铁鱼钩（墓）（1, 3/20；2、4-6, 1/5；3、7, 3/5）铜器 8 件，有盆、碗、镜、器盖和铍。

盆 1 件。广口宽沿，腹较浅，平底。盆两侧有铺首环耳，耳铜铁各一只，耳上部饰弦纹。盆壁甚薄，口部有焊接的补丁两处，应为实用器物。口径 38 厘米，底径 20 厘米，高 11.5 厘米（图十一，1）。

碗 3 件。敞口直壁，平底，口径 14 厘米，底径 8.5 厘米，高 6.5 厘米（图十一，2）。

镜 1 件。桥钮，圆钮座，钮外一周连弧纹和栉纹，窄边。镜残甚，铭文圈内有四乳钉，铭文难以辨认，字体较方，应为昭明镜，直径 8 厘米（图十二）。



图十二 铜 镜  
(墓 38) 拓本(7/10)

器盖 1 件。似为壶盖，出自残墓。

镞 2 件。三棱形，后铤中空，残长 2.5 厘米。

五铢钱 10 枚，锈蚀严重，仅能辨识文字，属东汉。

银器有手镯 1 件，指环 2 件。

珠饰共 308 粒，大小形状不一，种类有琥珀、玛瑙、水晶、紫晶、琉璃、银珠、古玉、玉石、青金石和檀香珠等。

有肩石斧 2 件。一件灰白色，扁平，刃部两面磨光，长 6.5 厘米、宽 4 厘米。另一件也是两面磨光，青灰色，长 7.5 厘米，宽 3.5 厘米。这类磨光的有肩石斧在广东西部地区新石器时代至汉代遗址中常见。墓区附近虽然未见遗址，由于石斧是出自填土中，可能不属墓中的随葬品。

#### (四) 墓葬的时代和特点

这批墓葬与广东、广西其他地方的东汉墓相比，在文化面貌上基本相同，但也有一些特点。

在墓室结构方面，砖室墓全是长方形单室平底券顶，这是广东东汉砖室墓中最早出现的一种形式，广州曾有少量发现，时代属东汉前期，即汉章帝建初元年(76)前后<sup>[2]</sup>，使用时间也不长，不久就被其他形式取代了。徐闻这种砖室墓出现的时间应与广州的大体相近，只是数量多，延续的时间也长，到东汉后期仍见存留。这种墓在广西合浦也有发现<sup>[3]</sup>，当时徐闻县和合浦县同属合浦郡，文化面貌更相接近。至于用珊瑚石板建筑墓室，其他地方尚未见过。据当地居民说，徐闻的泥土难以烧制砖瓦陶器，目前农村也是用花岗岩石块砌墙，可见汉代用珊瑚石板建墓是因地制宜的办法。

随葬品数量不多，墓 3 出土的陶器盖系用圈足盆的圈足改制而成，墓 12 的铜盆经过几次焊接修补。出珠饰的墓虽多，但每座墓的数量都少，且伴出陶珠。随葬器物中还有一批铁斧、铁镞、铁刀、铁鱼钩和铜镞等工具、兵器，这种情况反映出墓主人的阶级地位应

属社会底层，可能是比较贫苦的农民、小商人、手工业者或士卒。墓内不用陶制模型明器陪葬，说明这种风气尚未在徐闻流行，与广州、佛山、韶关等地有很大的差别。

墓中普遍陪葬方格纹陶罐，这又与广州等地不同。在陶罐上拍印方格纹加盖长方形戳印作为装饰，广州地区出现并盛行于西汉前期，东汉前期已极少发现，其后趋于消失<sup>[4]</sup>。在广东连平、韶关、佛山等地和香港的东汉砖室墓中虽然也有出土，数量都不多<sup>[5]</sup>。而徐闻华丰村，在 25 座未受扰乱的墓中（内有 4 座墓无随葬器物）就有 14 座墓出方格纹陶罐，在各种陶器中所占比例最大。在广西合浦的汉墓中也出这种陶罐，而合浦地区、湛江地区和海南岛的汉代遗址中，这些方格印纹陶罐残片更是常见，说明东汉时期它是这一带居民喜爱的陶器装饰花纹。

槟榔埭村的墓 38 出土一面体小质差的昭明镜，字体较方，减字甚多，当属西汉晚期到东汉前期。在华丰村、槟榔埭村出土的铜盆、铜碗，也是广州地区东汉前期墓内常见的器物<sup>[6]</sup>。51 座墓共出土 26 件铁器，总的看比例不大，但是其中红坎村墓 47 就占 14 件，说明东汉时铁器在徐闻已普遍使用，才较多地随葬墓中。

红坎村出土的陶器与华丰村的有些差别，墓 47 的三件小陶钵挂着绿色釉，这是广东地区东汉末至东晋、南朝墓中常见的器物。红坎村出土的方格纹陶罐也少，在 12 座墓中仅墓 51 出土 2 件，其他陶罐施水波纹和篦点纹，都是年代比华丰村墓较晚的特征。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徐闻这批墓葬应属东汉，华丰村、槟榔埭村的墓具有较多的东汉前期特征，红坎村的墓年代稍晚，当属东汉后期。总的说，徐闻墓和广州墓在文化面貌上大体一致，但延续时间较长，如广州西汉墓的一些特征在徐闻墓中仍见存在，而东汉前期的特征，在徐闻又延续到东汉后期。

## 二、汉代徐闻县城的地理位置

关于汉代徐闻县城的地理位置问题，意见不一。有人认为在现今海康县城的位置上<sup>[7]</sup>，有的又认为在雷州半岛南端。从徐闻的考古发现看，笔者同意后一说，即在雷州半岛南端、琼州海峡中部偏西的海边。

近年来，除了发掘 51 座东汉墓外，还在徐闻发现了一批汉代的遗址和墓葬，计有：

1. 在西连公社瓜藤村瓜藤岭上发现东汉砖室墓，形制和华丰村的相同，长方形单室券顶，小红砖。
2. 在西连公社田西村濒临北部湾的海边山坡上发现汉代方格纹硬陶片，估计是一处遗址。
3. 在角尾公社包西村包西岭上发现汉代方格纹硬陶片和东汉的红色小墓砖，包西岭也靠近北部湾海边。
4. 在迈陈公社华丰村华丰岭两侧发现古代遗址。岭东一处，在长宽各百余米的山坡



上散布着许多陶片，有米字纹、方格纹加戳印和水波纹的硬陶片，夹砂陶片，表面黄褐釉的陶片，还有南朝青釉陶碟残件和唐代的莲花纹瓦当等遗物。岭西一处范围也颇大，地面除见米字纹、方格纹陶片外，还有一些磨光的残石铤、有肩石斧和砺石。陶器上拍印米字形花纹，广州地区流行于战国时期，西汉初年已极少见。徐闻东汉墓中没有发现这种纹饰的陶器，可见应属西汉或略早。

5. 在竹山公社二桥村、港头村、迈熟村等地发现东汉砖室墓。二桥村在槟榔埭村南面的琼州海峡海边，1963年社员们在村北发现几座东汉砖室墓，出土各种陶罐和铜剑、铜镜、铜碗等器物。墓砖较大，长30厘米，宽15厘米，厚4厘米，侧面印有各种几何形花纹。1975年村民们又在同一地方挖水渠，在60米长的渠道中就发现5座东汉砖室墓，出土一批陶罐，还有陶屋、陶灶等模型明器，看来这里的墓葬和其他地方不大相同。港头村在二桥村西北1公里，迈熟村在二桥村东面5公里，也都发现东汉砖室墓并出土一些陶器。

6. 附城公社沓磊村也位于海峡岸边，与现今通往海南岛的轮渡港口海安仅隔一道海湾。村后高坡上发现有方格纹陶片，村前沙滩边还采集到东汉的五铢钱。

上述遗址、墓葬以及经过发掘的51座墓葬全都分布在东起红坎村、西起北部湾的滨海一线，最北的槟榔埭村距海峡也仅6公里。数量众多而时代又大体相近的遗址、墓葬集中在这一狭长的地带，说明当时这里应是人烟稠密地区。在雷州半岛的其他地方，虽也发现有汉代的遗址和墓葬，不仅数量少，也远不如这里密集。新中国成立后，广东各地发现的汉墓凡密集成片者，几乎都是当时的郡县城郊。因此，我们认为汉代徐闻县城应该位于这片范围之内。虽然这些遗址和墓葬大都属于东汉，西汉的较少，但东汉是继西汉而来，古代文献也未见有转移县城的记载。而且，《徐闻县志》上也有一条记载可以和考古发现互相印证：“徐闻城，汉元鼎置，海滨讨网村”。“讨网港，县西南三十五里”<sup>[8]</sup>。“讨网村”和“讨网港”都在华丰村西南3公里处，正位于我们所说的范围之内。据当地老人说，“讨网”和“土旺”在土语中发音相同，为取其语含吉利，数十年前才将“讨网”改为“土旺”。

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看，徐闻县城应是一个港口，又是广东通往海南岛的门户，上述的地理位置正好符合这两个条件。现今的海康县城位于雷州半岛中部，并

非海港，距海峡也较远，附近也未发现大片的汉代遗址或墓葬，因此不可能是汉代徐闻县城的故地。当然，这里只是指出了它的地理位置和大体范围，至于具体地点还有待今后的考古发现。

### 三、徐闻是汉代内地通往海南岛的门户

海南岛是我国第二大岛，自古以来就与祖国内地关系密切，经济文化都受到强烈影响。尤其到了汉代，汉武帝于元封元年（前110）在海南岛设置珠崖郡和儋耳郡<sup>[9]</sup>，政治上的统一更加速了它的经济开发，并进一步促进了与内地的文化交流。徐闻由于处在优越的地

理位置，始终起着通往海南岛的门户的作用。发掘和研究徐闻的汉墓，对探讨汉代以至更早时期祖国内地与海南岛的关系也有重要价值。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琼州海峡两边古代的文化面貌和发展情况都很相近。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广西合浦地区、广东湛江地区和海南岛发现的汉代以及汉以前的文化遗址多达二百余处。这些遗址都分布在河流两岸、沿海港湾的山冈台地和沙丘上，范围一般在数十米至百余米之间。遗址的年代大体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属西汉以前，遗址里的石器以磨制的斧、斨为主，打制或半磨的较少。海南岛石斧比石斨多，有肩器较少。陶器全是夹砂粗陶，内陆多为黑色，海南岛多为红色，但也有黑色或灰色的。第二阶段的遗址，内陆上石器显著减少，在斧、斨之外有铲、网坠和装饰品等。海南岛情况与此相似，石器中斨多于斧，有肩器增多，并常见石铲、石子、石戈、石质或陶质的网坠以及装饰品。陶器方面，夹砂粗陶大为减少，常见的是米字纹、方格纹和水波纹硬陶片，个别遗址还出青绿釉硬陶片。在内陆遗址里曾见有青铜器碎片，海南岛则发现过汉代的五铢钱。很明显，这个阶段的遗址应属汉代。<sup>[10]</sup>

这种文化内涵的一致性充分反映出古代海南岛的社会发展一直受到内陆影响，只是海南岛的步子似乎稍慢一些。广州地区常见的夔纹、云雷纹陶器西向只到阳江县一带，阳江以西几乎不见，这也说明汉代合浦郡和海南岛的社会文化比较一致，与广州地区有所差别。

《汉书·地理志》记述海南岛的社会生活说：“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禾稻纡麻，女子桑蚕织绩。”“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鏃”。这和考古发现是基本相符的，但它讲的是西汉的情况，看来当时海南岛的金属兵器、工具尚少，在原始的农耕、纺织和圈养家畜外，还伴以渔猎和采集经济，社会组织大体处于原始社会晚期。西汉以后，随着内陆人民不断徙居和前来进行商品贸易，自然会带来先进的耕作技术和金属用具。在徐闻的东汉墓里出土有铁斧、铁凿、铁刀和铜器、五铢钱，由于仅隔一道海峡，必然也会传播过来。在海南岛的汉代遗址里虽然尚未见到铁器，但已有五铢钱。在临高县还出土了两件汉代的青铜锅<sup>[11]</sup>，饰弦纹和羊、鸟等动物纹样，大的器高36厘米，口径64.5厘米，器形硕大精美，显示了当时的金属铸造水平。

#### 四、汉代徐闻在海外交通中的地位

两汉时期，徐闻是我国南方的海外交通港口之一。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海船从“徐闻、合浦”出发，沿着中南半岛南下，可远抵印度南部的黄支国。这种海外交通从汉武帝时已经开始，由汉朝宫廷的黄门直接掌握进行官方的交往和贸易，“黄金杂缯而往”，“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以满足宫廷和官吏的需要。西汉末年，王莽曾请黄支王送来犀牛。东汉前期，由于西域陆路交通受到阻塞，南方海路显得更加重要。至于民间的海外贸易，大约在汉武帝之前早已进行，后又伴随官方交往继续得到发展。

这次在徐闻发掘的东汉墓能直接反映与海外贸易等有关的遗物不多，这主要是这批墓葬的死者生前社会地位低下，经济比较贫困的缘故，可作为直接反映的，只有珠饰一项，与海外贸易似有一定关系。14座墓共出308粒，出20粒以上的墓仅5座。在珠饰中，有琥珀1粒，玛瑙25粒，水晶3粒，紫晶2粒，琉璃127粒，其他是银珠、古玉、玉石、青金石和檀香珠等。这种情况和广州（汉南海郡郡治）、合浦（汉合浦郡郡治）、贵县（汉郁林郡郡治）等地的东汉大墓相比，数量相差悬殊。因此我们怀疑这批珠饰，很可能也是来自民间的海外贸易。

作为一个海港，徐闻的条件远不及合浦和广州。徐闻偏于雷州半岛南端，附近自然条件较差，无内河行驶，陆路也甚困难。汉代徐闻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海港，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海上航线行经这里。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看，汉代船舶还只能沿着内陆岸边行驶，广州合浦间的航船一定要穿越琼州海峡，徐闻正是必经之地。因而能在当时的海外交通中占有一席之地。

西汉时期的徐闻是我国南方滨海的重要县治，由于地处雷州半岛南端，扼守琼州海峡，使它不仅成为祖国内陆通往海南岛的门户，而且在海外交通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这次在徐闻发掘的东汉墓葬数量可观，虽然都是一般平民小墓，但已从出土的各种遗物看到当时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雷州半岛一带属于海疆边区，秦汉以来在中央政府所置的郡县治理下，经过广大群众的辛勤劳动，积极吸收内地先进生产技术和输入各种金属用具，迅速地发展了生产，改变了过去的原始面貌。到东汉晚期，雷州半岛及其附近地区无论是经济开发和文化发展程度，都已和内地大体一致，这一点在徐闻汉墓中是表现得十分清楚的。

#### 注 释：

[1] 《汉书·南粤传》：“（元鼎）六年冬……南粤已平，遂以其地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九郡。”《汉书·地理志》记：合浦郡，“县五：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卢”。

[2] 黎金：《广州的两汉墓葬》，《文物》1961年第2期。

[3] 杨豪：《广东合浦发现东汉砖墓》，《考古通讯》1968年第6期。现合浦已划归广西壮族自治区。

[4] 广州市文管会广州汉墓发掘资料。

[5]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韶关市郊古墓发掘报告》；广东省文管会：《广东佛山市郊洪石东汉墓发掘报告》，《考古》1964年第9期。广东连平县附城公社西门岗东汉砖室墓也出土方格纹加戳印的陶罐，材料未发表。1955年8月，香港九龙李郑屋地方发现东汉中期的砖室墓一座，其中也出土有方格纹加戳印的陶罐。

[6] 广州市文管会广州汉墓发掘材料。

[7] 中山大学徐俊鸣同志在《两广地理》第六章《历史地理概述》中认为：“古徐闻在今海康县”。1957年，上海新知识出版社。

[8] 见《徐闻县志》卷一《舆地》和卷三《建置》，清宣统三年王辅之撰修，1936年雷州雷阳印书馆重印。

[9] 《汉书·地理志》：“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

[10] 广东省文管会：《广东南路地区原始文化遗址》，《考古》1961年第11期。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海南岛原始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11] 梁明燊：《广东临高县出土青铜釜》，《考古》1964年第9期。

（本文辑自1997年《考古》第4期，执笔者：何纪生、吴振华）